

# 制造“中产”：阶层流动渴望公平畅通

文/李煜

## “文革”时期：“中产”阶级子弟向下流动

中国最近的60年风云激荡，社会结构巨变，不同阶层在结构中的位置也是起起落落。谁在中间，这在西方稳定结构中不言自明的问题在中国也变得扑朔迷离。在有些历史时期，不要说中产的含义、应该包括哪些群体，就是用中产这个词都有些可笑。但是为了保持时期间数据的可比性，我们不妨仍然用这个词来代表相对应的那些职业群体。

改革前(特别是“文革”时期)社会流动的主要体制特征在于，国家对工农子弟采取一系列庇护性的政策。原处于社会下层的工农阶级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加，与优势阶层子弟之间的差距得以缩小。虽然其中很多政策未见得公平甚至是灾难性的，比如高等教育的全面萎缩和依据阶级出身决定升学、就业和升迁的机会，但客观上拉平了不同家庭背景子弟在社会流动机会上的差异。

根据一个对全国城镇居民的大型调查：在“文革”期间，有近2/3的非体力阶层来自普通工农的子弟，而这一比例在“文革”后下降为不到一半。另外一个数据是，“文革”期间，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弟仅有1/4为非体力劳动者，“文革”后这一比例上升为1/3强。有学者对此现象概括为，“文革”时期“中产”阶级子弟的向下流动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工农子弟在流动机会上的劣势在一定程度上被弥补，但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而且长期停滞不前，产业结构也一直以农业为主，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尚未发生，整个社会未能提供足够多的新就业岗位和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流动在总量上水平较低，工农子弟向上流动的绝对机会并不多。所以，“文革”时期社会流动的总体特征是质“高”量低，虽然这个质“高”仅仅是统计意义上的，背后的是另外一种政治意义上的不公平。

## 90年代：社会流动的黄金时期

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特别是1992年后开启的市场化改革浪潮，对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机制都产生的深刻的影响。回顾改革前后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现代社会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一种以“自致性”为主的社会流动机制正在逐渐代替以“先赋性”为主的传统社会的流动机制。虽然户籍制度(和基于此的社保制度)和人事制度还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的不平等，但在总体上而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大大增加了中产职业在劳动者中的份额，做大了蛋糕；市场经济的绩效原则和市场制度的渗透与扩张，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重个人能力、个人努力的筛选机制，推动着各阶层社会流动机会的均等化，增加了普通工农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形成了以绩效竞争为特征的流动模式，社会结构的开放性程度提高。社会学家用一个叫“关联系数”的指标来衡量代际间职业地位的相似性，如果该指标越高，说明一个社会代际地位的继承性越高。这个指标在

80年代为1.3，90年代下降到了0.7。

## 当前社会流动的挑战

当前对社会流动的最主要的挑战来自社会各种资源和机会不平等的累积和扩大。到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财富的分配由改革初期的人人得益的扩散型，又开始出现重新积聚的趋势，优势社会群体逐渐占有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社会机会，马太效应开始显现。贫富分化、成功机会的不平等分布和社会公共资源不均衡占有，这些社会不平等因素经过若干年的沉淀、累积，最终将影响到代际的社会流动。

对于中产阶级而言，最主要的位置传递途径是以教育为中介实现地位的间接传递，即通过帮助子女获得更高、更好的教育，进而确保其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但通过教育传递地位是有“损耗”和不确定性的。因为教育筛选是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竞争机制，普通工农子弟也可以借此实现自身的向上流动。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既是实现中产阶级实现代际继承的中介，也是工农子弟实现知识改变命运的向上流动通道。

但当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恶化、家庭资源差异随着社会阶层分化而拉大时，教育的公平筛选功能将被弱化。如农村孩子因贫辍学，城市重点学校普遍存在的“条子生”、“票子生”等教育不平等现象，都是家庭经济背景冲击教育筛选公平的例证。在职业获得环节，权力特权和家庭社会关系网的作用会直接颠覆劳动力市场的筛选规则。

所以，在社会不平等拉大的现实条件下，代际流动将因此受到阻碍，在教育获得和职业获得的两个过程中，先赋性的家庭背景因素的作用因此可能得以增强。如果真的是这样，普通工农子弟成为中产的机会将

减少，社会流动的模式将日益趋向封闭，社会各阶层间的壁垒扩大，阶层间的关系走向对立。

根据国内外已有经验，现在我们观察到的情况的确不容乐观。如果仍然从社会流动质和量的角度来看，即

使未来中国的经济结构顺利实现产业升级，并仍然保持高速增长，从而能为社会成员提供较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但由于流动竞争环境的恶化，仍然可能导致流动机会更不公平的分布，呈现“量大质低”的格局。■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